

高职院校经济性择校行为学生的自我认同危机探析

余思慧 瞿瑞 温广玥 高雄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院校的扩招与各级资助机制的日益完善, 考生在高考升学时的经济性择校行为也随之增多, 其中, 入学高职院校的经济性择校行为也不容忽视。本文从理性选择理论视角出发, 分析高职生经济性择校行为的客观动因以及理性选择背后所带来的群体自我认同危机, 最后为存在经济性择校行为的高职生的自我认同积极构建提供建议。本文认为部分高职生因为家庭经济情况而被迫选择职业院校就读, 成为了经济性择校的一员, 而正由于行为的被动性、教育身份的落差, 学生本人往往会陷入自我认同危机的困境。因此校方通过资助工作对学生在现实层面给予一定的经济帮扶之余, 可以对这一群体深入开展心理帮扶工作。

关键词: 经济性择校; 高职院校; 自我认同危机

高等教育是教育体系中的最高阶段, 具有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功能, 在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化中, 高等教育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此, 学生在进入高等教育时的择校行为值得关注。高等教育择校指个体在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前对院校的选择, 对于学生个体而言, 择校行为是一个系统性的决策过程。大部分学生在根据入学统考成绩择校时, 除了因兴趣爱好、父母建议、地域位置等因素主动择校外, 还存在一部分学生基于对家庭经济水平考量进入了不甚满意的学校或专业。综上, 本文提出经济性择校概念, 试图更好理解这部分群体的决策行为。

近年来, 得益于“教育扶贫”、大力扶持特定类型教育的相关政策以及各校对入学者的奖励机制, 产生经济性择校行为的学生会选择经济负担更小或者更够给予更多资助的高等教育院校就读。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各级资助机制的日益完善, 高考升学时经济性择校的行为也随之增多, 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有相当的必要性。

同时, 除了地区对口帮扶、免费教育师范生等特定项目政策框架支持下产生的经济性择校行为之外, 入学高职院校的经济性择校行为也不容忽视。在中国高考院校录取层级中, 本科院校分数总体在职业院校分数之上, 同时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高职院校获得更多的资金政策倾斜, 其中可能包含对高分入学的学生所给予的补助, 故此, 高职院校也是经济性择校的主要选择之一。本文试图从理性选择理论视角出发, 分析高职生经济性择校行为的客观动因, 以及理性选择背后所带来的群体自我认同危机这一消极心理状态的构建, 最后为存在经济性择校行为的高职生自我认同危机的支持与帮扶提供建议。

一、合乎理性: 高职生经济性择校的原因

学生的择校行为是一种选择行为, 牵涉众多的要素, 需要以系统的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目前, 已有一些研究者基于西方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对中国本土的教育决策行为开展了研究, 本文以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为理论视角, 试图呈现高职生经济性择校行为的原因。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 个体行动者的行动都具有价值偏好、目的性和功利性, 是个体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获取价值

或追求效益的过程。在理性选择理论中, 社会资本广泛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 被行动者利用以实现自身选择目标。由此, 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中尤其重要。按照社会资本的形成原因划分(吴克明等, 2021), 大学生的社会资本包括先赋型社会资本和后致型社会资本。前者指从出生就获取的社会资本, 主要通过家庭背景获得, 可以被理解为学生从家庭获取的经济资源等。后者指通过自身的社交网络不断积累的社会资本。在高等教育场域, 学生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程度和资本转化效果是影响升学、就业选择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综上, 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水平)是高职生择校的重要考虑依据, 部分高职生因为民办大学学费昂贵以及家庭经济情况的共同作用, 而被迫选择职业院校就读, 成为了经济性择校的一员。

二、理性背后: 经济性择校高职生自我认同危机构成

自我认同是青年时期个体发展中的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这一时期的重要转折点或重大事件通常会对自我认同产生挑战, 并有可能导致个体陷入自我认同危机(徐东兴等, 2015)。高职院校中存在的经济性择校行为是在升学关键节点时学生及其身后的社会资本思考后合乎理性的选择。然而在这一选择之后, 由于行为的被动性、教育身份的落差, 学生本人往往会陷入自我认同危机的困境。

(一) 无能为力向下选择

可负担性指以就学费用为标准的衡量下, 家庭经济条件与获得来自政府或机构经济资助的总和。经济性因素带来的择校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以往研究对教学层次相对弱势高校的学生入学原因调查(Conti, 2022)发现可负担性是影响学生择校的重要因素。然而这一因素并不是择校的必然因素, 这种被迫性择校让本应该成为主要因素的比如学术水平等成为了陪衬, 这使得学生无法获得与其学业水平评价相应的就学机会。

在中国高考制度下, 学业水平是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前升学择校时的核心依据, 不同层次的院校所需的考学分数存在着分明的梯度。根据办学实力和归属, 中国高校大体可以分成6个层次: 985高校、211高校、省重点建设高校、省属一般性高校、民办高校以及高职高专, 招生批次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次、专科批次, 学生根据高考成绩的高低可以对应从不同录取分数层级与时段进行志愿填报。

其中, 以高职院校作为选择目标的经济性择校行为往往来自于考学分数处于民办高校而未达到公立一般高校的学生。民办高校由于获得政府资助较少, 自主办学需要自负盈亏, 考虑运营成本将对学生收取较高的学费和相关费用, 在校获得资助的机会也较少。于是一部分无力支付民办高校费用的考生手握超过本科分数线的成绩, 被动向下选择来到了公立高职院校就读以减轻学费负担、并获取高分入学奖金以及其他资助。在基于客观条件不得不选择的情境下, 考生们倾向于结合自身考学成绩与负担能力, 在经济许可的范围内选择了教育层次和目标院校。然而, 这一不得不向下选择的行为使得其教育身份从本应存在的本科层次变为专科层次, 由于就业层面的结构性制度限制, 这一教育层次的变

化对其未来发展产生着关键性影响,同时社会对职业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学生存在的污名时刻提示着学生在择校时的无能为力。

(二) 深受社会刻板认知与就业限制的教育身份

在中国,高职生群体一直存在被消极认知和不公正对待的现象,其根源可能是高职生群体在分流考试中较低的学业评价。高职生的生源主要分为是中职学校毕业生(包括中专、职高、技校学生等);二是普通高中毕业生,而在普职分流节点中进入职业教育的原因往往是学业成绩不佳,所以相较于本科学生,高职生被社会认为是教育竞争中被筛选通往次等教育的被分流者。学业方面的评价不佳也渗入到了其他维度,社会将这种学业层面的“失败”泛化到职业教育学生的方方面面,比如,以往研究发现,对于高职生而言,存在的不公正对待在显性外化层面主要包括语言偏见现象、行为排斥现象以及的制度性不平等,在隐性认知层面具体为对能力低下、就业机会少且质量差(孙晓波,2021),同时,研究表明社会对高职学生的刻板印象除了能力之外还有在热情和道德方面的低水平(刘若瑾,2020),是为公众对高职生这一教育身份长期存在不合理的负面认知。

社会长期的认知习惯进而导致了劳动力需求方在就业方面对高职生存在制度性限制与非制度性的偏见,即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可能对高职生能够胜任的工作岗位上对教育背景进行限制使其因职业院校的教育身份无法投递简历,或在接收简历之后因职业教育背景淘汰于本科学生,以及在入职在工作环境与内容与他人区别对待等,在就业层面使得高职学生无法与本科层次的毕业生平等地参与就业市场的竞争。由此,本就因经济原因不得不就读高职院校的学生在毕业后通过自身努力以就业为途径获取经济资源更为困难,这一预期中的困难进而将转化为其求学过程中持续的压力与自我否定。

(三) 进退两难的自我认同危机

自我认同说个体在通过社会互动中对自我身份充分了解后所产生的认可和肯定,自我认同就是对自我身份的确认,而自我认同危机则是焦虑于自我身份与社会角色的不确定(孙运刚,2015)。学生群体的自我认同主要来自于学业情境中的能力,其直观展现形式就是学业成绩。经济性择校行为的高职学生容易产生自我认同危机,可能因为这一群体容易以学业评价为判断依据,自视以高分入学,在高职层次同学之间容易形成能力高位的自身判断。然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对个体的评价体系得到重构,以课外实践、兴趣才艺等能力评价维度的权重提升使得学业成绩不再是个体评价中唯一被看中的维度。即时是在学业成绩维度,在新的学段,所学科目也有着巨大的变化,原有学科基础存在一定的可迁移性但不能完全决定在大学的学业能力。在新学段的综合个体评价体系下,高考分数较高的学生仅以一时的学业成绩优势并不能持续支撑能力高位的自我身份认可。此外,社会对教育身份的态度对其自我认同也有着重要影响,基于被迫错失了本科生教育身份而成为高职生的一员之后,发现即使是能力高位的高职生也无法逾越职业教育身份的限制,在社会评价中总是相较低人一等。由此,经济性择校行为学生容易产生进退两难的矛盾感与挫败感,造成其对自身定位混乱与自我价值否定,进而产生自我认同危机。

自我认同危机在经济性择校高职生群体中的主要表征通常包括:因自我认知在能力高位导致的与人际、学业相关的入学适应不良、在充分了解和体验难以逾越的普职之别之后于专业技能学

习上的倦怠性消极或功利性积极以及由于自我定位的混乱所带来的持续性消极情绪,对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持续发展:从心理育人角度对经济性择校高职生积极自我认同构建的建议

近年来,国家开始加大职业教育发展力度,重点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以支撑产业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响应号召就读了高职院校,成为了高职生的一员。数据显示,2021年高职院校招生557万人,较2011年增长8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在国家着重培养职业技能型劳动者的背景之下,以较高分入学高职生本应以其较强的学习能力成为各行业专业技术人才中的佼佼者。

然而,高分段学生中的重要构成群体经济性择校行为学生容易因为择校时的决策以及自身的认知局限陷入自我认同危机的状态,对其入校适应、情绪调适以及社会化成长等各方面都有着消极影响,不利于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习得与综合素质全面提升的持续发展,进而极大地阻碍了这一具有极强学习潜力的群体深耕专业领域与投身产业建设。

随着高职院校的扩招与经济性择校行为群体规模的增大,校方应加强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识别与关注,首要做好资助育人和心理育人工作。首先,通过资助工作对学生在现实层面给予一定的经济帮扶。其次,心理育人是高校进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校方可以这一群体的心理困境为切口深入开展心理帮扶工作,积极通过提供入学适应、自我认知与情绪管理等主题的辅导,营造良好的校园心理健康氛围等方面措施构建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针对性的心理育人体系,发挥心理育人实效,切实帮助经济性择校行为入学的学生度过相关的自我认同危机助力其全面发展,为国家的各大产业建设培育具有综合素质高、技能本领强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 刘若瑾. 高职生学历污名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群体认同和相对剥夺感的双重损伤作用 [D]. 长江大学, 2021.
- [2] 吴克明, 刘若霖, 钟云华. 社会资本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两面性研究: 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 [J]. 教育与经济, 2021, 37(4): 7.
- [3] 孙运刚. 高职生自我认同感的调查研究及相关提升策略 [D].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 [4] 孙晓波. 基于扎根理论的高职生教育身份歧视研究 [J].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1, 33(04): 58-65.
- [5] 徐东兴, 何姣, 徐慰, 等. 一例大学毕业生自我认同危机的心理咨询 [J]. 科教导刊(中旬刊), 2015.
- [6] 詹姆斯·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作者简介:

余思慧(1996.3-),女,汉,广东梅州,助教,教育与发展心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

瞿瑞(1997.5-),女,汉,云南红河,助教,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温广玥(1995.12-),女,汉,山西临汾,助教,地质工程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与劳动教育

通讯作者,高雄(1993.11-),男,汉,河北怀安,助教,心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临床与咨询心理学。